

# 唐代来华的波斯使臣、僧侣和商人

赵 静

(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)

[摘 要] 由于经济联系的繁荣,交通条件的便利和对外政策的开明,使得唐代的中外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。各国使臣、僧侣、商人、留学生和艺术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本文主要从来华的波斯使臣、僧侣和商人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唐代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。

[关键词] 唐代 波斯 使臣 僧侣 商人

由于海陆交通的空前发展,唐代政府又以恢弘的气度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,大大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各族人民的交往和交流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说过:“学问虽远在中国,亦当求之。”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在巴格达建新都时说:“这里有底格里斯河,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。”<sup>[1]</sup>

人员交往是两种文明或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的前提。“中国国威即于西陲,以汉唐两代为最盛,唐代中亚诸国即以‘唐家子’称中国人,李唐声威之烜赫,于是可见也。”<sup>[2]</sup>

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,几乎亚州的每个国家都有人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。在来唐的外国人中,最主要的是使臣、僧侣和商人这三类,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政治、宗教和商业三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<sup>[3]</sup>。

## 一、唐代来华的波斯使臣

萨珊波斯王朝存在的四百多年中,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、隋朝、唐朝前期,为西亚最大的国家,始终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。“炀帝遣车骑尉李昱通波斯,寻遣使随贡方物。”<sup>[4]</sup>《隋书》还确切记载了波斯国王“库萨和”,“库萨和”显然就是当时的波斯国王库斯老二世(Chosroes II, 590—628)名字的转音<sup>[5]</sup>。

唐初,平西突厥汗国,使波斯与中国之间的交通障碍完全解除,创造了双方得以密切往来的客观条件。从7世纪30年代起,阿拉伯人在向东扩张中对波斯发动了一系列战争,使萨珊王朝岌岌可危,成为萨珊王朝积极寻求中国支持的内在动因。波斯王朝伊嗣俟曾在逃亡之中于贞观十三年(639)、贞观二十一年(647)和贞观二十二年(648)三度遣使来华,以求联合唐朝对抗大食。

在唐代,来华的波斯使臣中阿罗憾最为有名。1909年端方在《陶斋藏石记》中刊布了阿罗憾墓志的碑文。<sup>[6]</sup>林梅村先生,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,根据上下文将端方缺失的七字补入五字:“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、左屯卫将军、上柱国、金城郡开国公、波斯君丘之铭。君讳阿罗憾,族望波斯国人也。显庆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,名闻[西域],出使召至来此,即授将军北门[右]领使,侍卫驱使,又充拂林国招慰大使,并于拂林西界立碑,峨峨尚在。宣传圣教,实称蓄心。诸国肃清,于今无事,岂不由将军善导者,为功之大矣。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藩王,建造天枢,及诸军立功,非其一也……景云元年四月一日,暴憎过隙。春秋九十有五,终于东都之私第也……。”<sup>[7]</sup>

羽田亨、佐伯好郎、桑原鹭藏、张星娘、向达、罗香林、蒲立本、石田干之助、饶宗颐、谢海平、朱谦之、方豪、朱杰勤、姜伯勤、林梅村诸位学者对此碑做了研究和介绍,或对有关研究做了述评。上述作者一致同意阿罗憾是景教徒。罗香林、朱谦之、林梅村进而认为阿罗憾是景教碑上的僧首罗含<sup>[8]</sup>。

然而,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。富安敦在1987年提出

了阿罗憾并不属于任何宗教,他名闻遐迩,因此唐高宗把他招来,即授羽林军的将军,这正是后来给与名义上的波斯国王卑路斯和泥涅师师的品级,可见阿罗憾在中国被视为与波斯国王相侑的人物<sup>[9]</sup>。

马小鹤认为,阿罗憾是波斯残存势力的代表之一。《赞德·瓦赫兰·恩中》记载,千年之末会有一个叫瓦赫兰的英雄降生,帮助救世主乌希达尔。阿罗憾的名字正是钵罗婆文中的瓦赫兰,遂众望所归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他又力主与唐结盟以推动复国运动,这正符合和唐朝时候倚重波斯贵族,号召乌浒水至印度河流域的民众建立羁縻体制的构想<sup>[10]</sup>。因此,唐高宗遣使把他请到长安,授之以将军之职,又授拂林诸藩招慰大使,并于拂林西界立碑。榎一雄与岑仲勉先生一致认为阿罗憾在拂林西界所立之碑,即高宗御书、王名远在吐火罗所立之碑。岑仲勉先生认为,所谓拂林诸藩,也就是吐火罗诸藩,阿罗憾实际上就是吐火罗诸藩招慰大使<sup>[11]</sup>。

“延载元年(694),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于端门之外,铭纪功业,黜唐颂周。诸胡聚钱百万亿,买铜铁不能足,赋民间农器以足之。其高一百五尺,径十二尺,八面,各径五尺,下为铁山,周百七十尺。武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。”<sup>[12]</sup>

## 二、唐代来华的波斯僧侣

由于唐代采取文化包容政策,对外来宗教持兼容并蓄的态度,因此大量僧人来华传教,促进了中国与东亚、南亚、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。由于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的传入,大量波斯僧人来华传教,其中有记载的景教徒人数颇多。

密乌没斯,摩尼教传教士。《佛祖统记》卷三十九记载:“延载元年(694),波斯国人拂多诞持《二宗经》伪教来朝。”拂多诞是摩尼教经师,汉译“知教义老”。慕阇是摩尼教法师,汉译“教师”,职称在拂多诞之上<sup>[13]</sup>。《二宗经》是摩尼教经典,为摩尼所著。

阿罗本,第一位来华的景教传教士。据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碑文所载,唐太宗贞观九年(635),阿罗本到长安,“带使宰臣房玄龄总仗西郊,迎宾馆内,接待可谓异常隆重。史载:“贞观十二年七月,诏曰:‘道无常名,圣无常体,随与设教,密济群生。’波斯僧阿罗本,远将经教,来献上京。详其教旨,玄妙无为,生成立要,济物利人,宜行天下所司。即於义宁坊建寺一所,度僧廿一人。”<sup>[14]</sup>唐太宗批准景教在中国合法传播,而且给阿罗本加上“镇国大法主”这一尊号。高宗时期沿袭了这一称号,并下令全国建造景寺,从而推动了景教的发展,出现了“法流十道”,“寺满百城”的局面<sup>[15]</sup>。

僧首罗含,即称僧首,当为景教在中国的总负责人。罗含之名在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中出现两次,一为“圣历年释子用仕,腾口与东周,先天末下士大笑,汕谤于西镐。有若僧首罗含,大德及烈,并金方贵绪,物外高僧,共振玄纲,俱为绝

纽”；一为“诏僧首罗含、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。于是天题寺榜，额载龙书，宝装瑰翠，灼烁丹霞，睿札宏空，腾凌激日，宠赉比南山峻极，沛泽与东海齐深。”<sup>[16]</sup>讲述了他与其他景教徒挽救景教危亡，并使之振兴的事迹。对于僧首罗含与波斯大酋长阿罗本是否为同一个人，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，可参看罗香林、林梅村等学者的文章。

大德及烈，景教领袖，他曾与僧首罗含领导了景教与佛道两教的斗争。《新唐书·柳泽传》记载：“开元中，转殿中侍御史，兼岭南选。时市舶使、右威卫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，译上书曰：‘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是知见可欲而心必乱矣。’”<sup>[17]</sup>这件事在《册府元龟》卷五百四十六记载为：“柳泽开元二年（714）为殿中侍御史，岭南监造使，会市舶使右威卫郎将周庆立、波斯僧及烈，广造奇器异巧以进，译上书谏曰：‘臣闻，不见可欲使者心不乱，是知见可欲而心乱必矣……’”<sup>[18]</sup>，此时及烈身份是僧侣，也可能是工艺指导者或者商人。《册府元龟》中还有两处提到及烈之名，卷九百七十一记载：“开元二十年九月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”<sup>[19]</sup>，卷九百七十五记载：“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，授首领为果毅，赐僧紫袈裟一副，及帛五十匹，放还蕃。”<sup>[20]</sup>冯承钧先生认为及烈是职名，非人名，方豪先生认为这个及烈与柳泽所劾及前后距十八年，不可能为同一个人，沙畹、穆尔、武伯伦和罗香林认为是同一个人。穆尔说及烈两次来华身份不同，第一次是访问者，第二次是使者。<sup>[21]</sup>无论角色如何，及烈一直活跃在中华大地或丝绸之路之上。

伊斯 向达先生认为，伊斯即为 Izdbuzid 一名译音，盖即吐火罗斯坦（Tahuristan）地方王舍（Balkh）城故景教僧珉（Milis）之子<sup>[22]</sup>。伊斯曾效力于郭子仪的朔方军中，“效节于丹庭，策名于王帐”，使得肃宗“于灵武等重建景寺”<sup>[23]</sup>，作为奖励。

景净 唐德宗建中二年（781）撰写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碑文。他曾与迦毕试（罽宾）高僧般若合译佛经《六波罗蜜经》七卷，“时为般若闲胡语，复未解唐言，景净不解梵文，复未明释教，虽称传译，未获半珠。”圆照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称景净为“大秦寺波斯僧”，则景净确为伊斯兰血统之中亚人<sup>[24]</sup>。

其中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中一名叫“文贞”的波斯僧人，曾在唐朝入仕，据荣新江先生考证，此人便是1980年西安出土的《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》的主人李素，李素的家族是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<sup>[25]</sup>。

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中左右两侧列有景教徒的名字，共70人。据考证他们大都是外来的僧人，来自波斯或者叙利亚等地，这些来华的波斯僧侣不但传教，还翻译了大量的景教经典著作，促进了唐代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。

### 三、唐代来华的波斯商人

唐代海路交通空前发展，唐政府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，大批外国商人纷纷来到唐朝。唐代的外国商人主要有粟特人、波斯人、大食人、新罗人，此外还有天竺、罗马、日本、扶邑、真腊、骠国、狮子国、泥婆罗等国。波斯商人来华贸易盛极一时。

东来的波斯商人或者商队，有的独来独往，有的同阿拉伯（大食）商人结伴而来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了数条波斯商人来华记录。来华的波斯商人有两类：一类是随船或押运货物来华，贸易完后又随船回去；另一类是留而不去，他们在通商口岸设店经营。在京师长安的西市中，就有波斯邸，不仅出售珠宝香药，而且兼营钱庄业务。波斯商人在唐代以富有著称，称“富波斯”。李商隐在《杂录》上记载“不相称”现象：“穷波斯，病医人，瘦人相扑，肥大新妇，先生不识字，居家念经，社长乘凉轿，老翁入

娼家。”从相提并论的诸事看，说波斯人穷是不可思议的<sup>[26]</sup>。

唐代胡商由广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岭以入今江西，而集于洪州，故《太平广记》中屡及洪州之波斯胡人。至洪州后进入江苏，集于扬州，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，是以扬州之商胡亦不鲜。由洛阳然后再转至长安。故唐代长安之广州、洪州、扬州、洛阳、长安乃外国胡商胡集中之地也<sup>[27]</sup>。

上元元年（760年），“刘展反，邓景山引[田]神功助讨，自淄青济淮，众不整，入扬州，大掠居人资产，发屋剔穷，杀商胡波斯人数千人。”<sup>[28]</sup>这些数字或有夸大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斯商胡数量之多。

大批波斯商人来华，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药材等物品大量销往波斯，波斯的珠宝、银器、玻璃等物品也传到中国，促进了唐代中国与波斯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生活，加深了两国人们的友谊。

### 四、结语

向达先生曾提出：“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，大致不出四类：魏周以来入居中夏，华化虽久，其族姓犹皎然而寻者，一也。西域商胡逐利东来，二也。异教僧侣传道中土，三也。唐朝异族畏威，多遣子侄质于唐，因而久居长安，如新罗质子金允夫入朝充质，留长安二十六年之久，即其一例，此中并有即留长安入籍为民者，四也。”<sup>[29]</sup>由于大量的人员交往，繁荣的经济联系，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开明的对外政策，终将中国与波斯的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两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科学技术、医学和艺术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交流，对两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，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波斯人民的友谊。

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万明，何芳川.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[M]. 商务印书馆，1998:59.
- [2][22][24][27][29] 向达.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[M]. 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3:5-36.
- [3] 谢弗. 唐代的外来文明[M]. 吴玉贵，译. 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73:19.
- [4] [唐]魏徵、长孙无忌等《隋书》卷3《西域传》[M]. 中华书局，1973:1857.
- [5] 张国刚，吴莉苇. 中西文化关系史[M]. 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6:76.
- [6] [清]端方. 陶斋藏石记. 卷21. 清宣统元年:9-11.
- [7][8][9][10][11] 马小鹤《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》，收入荣新江、李孝聪《中外关系史·新史料与新问题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4:99-110.
- [12] 荣新江.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[M]. 三联书店，2001:215-216.
- [13] 沈福伟. 中西文化交流史[M]. 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:158.
- [14] [北宋]王溥《唐会要》卷49“大秦寺”条[M]. 中华书局，1955:864.
- [15][16] 郝贵远. 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[J]. 世界历史，1955（3）.
- [17][28] [北宋]欧阳修《新唐书》卷112《柳泽传》[M]. 中华书局，1975:4176. 卷144《田神功传》P4702.
- [18][19][20] [北宋]王钦若等《册府元龟》卷五百四十六《谏诤部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P6547. 卷九百七十一《外臣部》P11409. 卷九百七十五《外臣部》P11454.
- [21] 周贞祥. 从景教碑所铸僧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[J]. 文博，1993（5）.
- [23] 张星烺.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. 第一册[M]. 中华书局，1977:176.
- [25] 荣新江. 《一个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》，叶奕良《伊朗学在中国论集》第二集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8:82-90.
- [26] 王小甫.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[M]. 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6:156.

作者简介：赵静（1983-），女，河北定州人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7级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隋唐史。